

“整体性保护”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2007年6月,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设立。这标志着我国非遗的区域性整体保护之路正式开启。截至目前,文化部已批准设立晋中、徽州、热贡、羌族等21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涉及福建、安徽、江西、青海、四川等17个省(区、市)。



评论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需要打持久战

■王旭明

春节期间,我一直在关注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被选手或对答如流或苦思冥想所感染,被评委恰到好处点评和专业素养所折服。在各种拼明星、拼低俗的综艺节目统治荧屏的当下,这样的节目独树一帜,确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股清流。但我也知道,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简单地靠一档节目就能完成的,需要打一场持久战。

以古诗词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积淀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明因子。正如中央《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所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任务艰巨、意义深远、作用重大,现实意义非常突出。每一次行动、每一项措施和每一个人都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但是,这项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持久地努力。

强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性,是因为一些地方比较习惯于开展战役式的活动和声势浩大的运动,也比较注重形式和外表。这些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绝不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和全部。

就拿《中国诗词大会》来说,背诵古诗词固然很重要——它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表面和最基础的一步,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懂得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和融入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里,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灵魂以及精神骨髓。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较长的时间,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形成一种群体自觉和社会风尚,成为一种全民族具有普遍共识的价值追求。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其传承之路上命运多舛。即使是当下,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不统一。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华传统文化传承还存在重形式轻内容和简单复古等问题。

此前,中央领导同志曾经批评过一些地方将古代诗文从教材中拿出去的现象。虽然这些现象已经得到改正,但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和警醒。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绝不能因为一时一事而改变,也不能因为时代的变迁和各种借口而改变。在这方面,我们有明显不足,也有过深刻教训,须臾不能忘。

强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性,还因为很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大重要特征,是其精髓蕴含在传统典籍和浩瀚的古代文献中,学习之艰苦、传承之复杂,往往令人望而却步。虽然我们能用各种形式化难为易、化繁为简,比如《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成语大会》等节目,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一定的作用,但不可否认,以这样的形式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多人是带着好奇心、胜负感和娱乐状态参与的。一旦失去这些因素,就很难坚持下去。

不用说的,《中国诗词大会》如果连续举办十季,而且在形式上不出新,受众肯定会逐渐减少。这警示我们,一方面要变换各种形式,吸引广大受众尤其是年轻人;另一方面,还必须长期坚持不懈的心理准备。

那么,如何打好这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战?方法和手段有很多,但有一条是必须明确和强调的——那就是中央领导同志所指出的,优秀传统文化只有全方位融入国民教育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与人民生活深度融合,才能有长久生命力,真正实现活起来、传下去。这位领导同志的话,道出了如何打这场持久战的真谛。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教材中、落在课堂上、贯穿于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覆盖住学校内外更广泛的人群。

众所周知,学校教育主要是以课程为中心,通过教师运用教材和教法,完成对学生的教育过程。这一过程的主要框架是课程教材体系。现在的一大问题是,课程教材体系老化、教材陈旧,亟待改进和更新。改进和更新的主要方向,就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渗透进各个学科和教材中。

当下最紧迫的是:一要将更多的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充实进思想品德、语文、历史、地理和音乐、美术等较多涵盖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科目;二要尽快补充和调整现有教师知识结构,通过培训、考核等尽快使现有教师短时间内适应要求,完成教学任务;三是在各级各类考试尤其中考和高考中,充分发挥指挥棒作用,加大优秀传统文化的比重;四是有关部门要尽快整合现有学校课程资源,改变零散的、个别的和效率低的传统文化教育状况,优化课程,提高效率。

打一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战,是民族的希望,时代的要求,也是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让我们高扬起这面旗帜,肩负着这样的文化自信,而向世界,面向未来。

(据《新华每日电讯》)

还非遗以生存的土壤和空间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不等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区’,它至少还包括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物质文化遗产(文物)及其资源保护和其他人文精神财富保护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乌丙安说。

这种“整体性保护”,就是要还非遗以生存的土壤和空间。近年来,文化部不断提出指导意见,要求实验区建设要“见人见物见生活”,把非遗项目和其得以孕育、滋养的人文生态环境一起保护;在古村落和老街改造中保留原住民,保护原住民的生活方式,避免实验区内的传统村落、老街变成只有建筑和商铺、没有原住民的空心遗址,避免非遗失去传承的基因、环境和土壤。

以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该区域历史上长期处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汇地带,保留着根植于农耕文化中的民俗文化、粟文化、醋文化、酒文化、药文化、武文化、乐文化、农时文化等,传承着农工并举、商儒结合、耕读传家、乐舞相济等诸多代表性文化项目。当地政府不仅对区域内的物质文化遗产状况、非物质文化遗产状况进行了系统梳理,还对区域内的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湿地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情况进行了摸底,努力把非遗保护同当地的历史条件、现实需求及发展方向相结合,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关系密切的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景观都得以认定、建档并挂牌,并且依托旅游开发得到了恢复与修复。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无经验可借鉴

“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对非遗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是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一次探索和创新,可借鉴的国外经验少。”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祁庆富说。

据文化部非遗司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21个实验区中已有13个实验区的总体规划通过了论证和批复,正在实施;3个实验区的总体规划已经编制完成;2个实验区的总体规划正在编制;3个实验区的总体规划即将启动编制工作。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要经过相当长的周期才能完成。

尽管如此,国家和地方在边探索、边投入、边建设的过程中,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11年至2015年,文化部通过中央财政,支持10个实验区建设了151个非遗综合性传习中心。2016年,中央财政安排2390万元人民币,支持了18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62个非遗传习中心的建设与运营;安排2520万元在实验区增设287个非遗传习点。同时,参照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理念和做法,各省(区、市)也设立了范围有大有小、特色鲜明的146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整合多方资源形成非遗保护的合力

受文化部非遗司委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于2015年11月对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情况进行了评估。课题组发现,“保护区”这一“整体”虽然以概念的形式充分体现在山西省级文化部门与文化部、各市县

的工作对接之中,但是在保护区所辖各个区县的具体建设工作中并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容易混同于非遗项目保护的常规工作。比如,各区县还没有针对性的《总体规划》实施细则等地方性配套文件,跨部门的领导机构建设缺乏或无法发挥实质性作用,缺少“保护区”整体建设的专职责任人。

在区域文化研究专家、晋中学院教授李山岗看来,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问题是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的一个缩影。保护区建设依然停留在各个县市对于非遗项目的保护工作上,“保护区”概念中区域整体和资源共享的意义体现得较为薄弱。同时,保护区内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和农业、旅游、自然生态环境等资源条件尚未充分整合,而整合在某种程度上有赖于当地政府将保护区建设切实纳入区域发展规划。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将上述保护区建设中的不足归因于缺少日常有效运转的管理部门,这导致相关社会力量不能统筹协调,难以达到以共治的方式形成保护区整体效益的目的。课题组建议,要成立权力和责任明确的行政管理机构,在省政府领导中选取专门负责“保护区”建设工作的责任人,跳出各个厅局的层次,统筹保护区建设工作,推进各厅局和部门之间的深度合作与资源整合;加强当地社会组织的动员工作和实质联系,通过与社会组织、企业和学术研究机构等开展合作,鼓励社会组织自愿、积极开展非遗传承,最终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良性动力传递机制,以有限的资源实现广泛参与、有效传承。

(据《光明日报》)

究竟是谁设计了紫禁城

中国“无字天书”荣获 2017“世界最美的书”银奖

中国设计师朱赢椿作品——一本由昆虫爬行痕迹自然形成的“无字天书”,近日在德国莱比锡被评选为2017“世界最美的书”银奖作品。

“世界最美的书”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书籍装帧艺术评比。今年“世界最美的书”组委会共收到来自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赛作品近600件,最终推选出14本2017“世界最美的书”,分别来自世界7个国家和地区。

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积极推动下,由中国著名书籍设计师朱赢椿、皇甫珊珊设计,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虫子书》最终赢得银奖。该书堪称一本奇书,全书没有一个文字,完全诞生自设计师的奇思妙想。

为了设计这本书,设计师每日与工作室的各色昆虫朝夕相处,收集它们在叶子上啃咬或纸张上爬行后留下的痕迹,经过颜色处理,形成一幅幅形态各异的图画。

值得一提的是,这已是设计师朱赢椿第二次将“世界最美的书”收入囊中。他设计的书籍《不裁》2007年曾获“世界最美的书”铜奖。(据《中国文化报》)

河南发现距今10万年人类化石

参考消息网3月4日报道台媒称,古人类学关于现代人起源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是非洲起源说,一种是多地区起源说。而根据美国《科学》杂志一篇最新研究的论文发现,居住在中国北方的史前居民可能是当地人和欧洲古人类的后代。这发现挑战了学术界流行的中国古人类源自非洲的说法。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3月3日报道,河南许昌灵井遗址自2005年开始发掘,在出土2颗基本完整的古人类头骨之后,河南灵井“许昌人”遗址首次发现2块距今10万年的古人类肢骨化石。论文提及河南许昌灵井遗址发现的头骨化石(距今12.5至10.5万年)呈现中国古人类、早期现代人和欧洲尼安德特人的混合特征。

研究人员将出土的头骨化石碎片拼接成“许昌人”1号和“许昌人”2号两个头骨。发现它们在枕骨形态和内耳迷路模式上具有与尼安德特人相似的独特性状,同时许昌人也具有一些北京猿人的原始特征,包括低矮的头骨穹隆、扁平的脑颅、短小并向内侧倾斜的乳突。

(据中国新闻网)



“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唐代骆宾王寥寥几句诗,就把世人对帝王宫殿的尊崇与好奇表现出来了。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宫,故宫几百年来一直无比威严和神秘,直到被辟为博物院后,其真实面貌才逐渐向世人公开。

故宫雄踞于北京的中轴线上,将北京城分为东、西两部分,城墙内的面积约72万平方米,现存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明、清两代24位皇帝就居住在这里,几百年多少军国大策都由此发出,改变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命运。关于故宫的文献与实物异常丰富,可惜的是,独缺建筑设计者的资料。在那个时代,工匠的社会地位不高,虽说初建时有几百万人的建筑大军,留下姓名的却屈指可数,至于设计者是谁,就更成了历史之谜。

材料就准备了11年
1402年,一直镇守北方的燕王朱棣费尽心机,终于夺取了自己侄儿建文帝的天下,当上了大明王朝第三个皇帝。据说,当朱棣的军队攻破都城应天府(今江苏省南京市)时,建文帝在火海中下落不明。朱棣从此留下了一块心病,总是担心建文帝会从某个地方冒出来。朱棣登基不久,一心想

为建文帝报仇的御史大夫景清在朝堂上意图谋刺,险些要了朱棣的命。这之后,他经常做噩梦,加上又不习惯南京湿热的天气,便强烈怀念起居住多年的根据地北京来。

4年后,以丘福为首的大臣,建议在北京修建一座新的宫殿,朱棣非常开心,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一场浩大的工程于是拉开了序幕。朱棣先派出人员,奔赴全国各地去开采名贵的木材和石料,然后运送到北京。光是准备工作,就持续了11年。珍贵的楠木多生长在崇山峻岭里,百姓冒险进山采木,很多人因此丢了性命,后世留下了“人山一千,出山五百”来形容采木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开采修建宫殿的石料,同样很艰辛。现在保和殿后那块最大的丹陛石,开采于北京西南的房山。

史书记载了运送它时的情景:数万名劳工在道路两旁每隔一里左右掘一口井,到了寒冬腊月气温足够低时,就从井里汲水泼成冰道,用了28天的时间,才送到了宫里。此外,还要在苏州烧制专供皇家建筑使用的方砖——金砖,山东临清也要向北京运送贡砖。这些各地的材料大部分经由大运河船运而来,因此才有了“先有大运河,再有北

京城”这句俗语。

皇帝叫他“崩鲁班”

材料准备好了,永乐十五年(1417年),朱棣开始从南方调集大量能工巧匠,大兴土木,兴建宫城。故宫是严格按照封建宗法礼制设计规划的,前面三个大殿为外朝,是皇帝处理政务的地方;后面的宫殿群则为内廷,住着后宫嫔妃,是皇帝家庭生活的场所。

“左祖(太庙)右社(社稷坛)”和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也在故宫建筑中得到运用。依照中国古代的星象学说,紫微垣(即以北极星为中心的星区)是上帝居住之处,天人对应,所以皇帝的宫殿被称为紫禁城。

这片宏伟的建筑群,到底是由谁来负责设计的呢?据目前流传最广的说法,故宫的设计者是明代一位杰出的匠师,姓蒯(读“kuāi”)名祥。他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卒于成化十七年(1481年),苏州吴县(今江苏省吴县)香山。当时,进京的工匠中有一个香山帮,都是吴县香山或其门徒。他们往往擅长木工,其中又不出色的泥水匠、漆匠、石匠、堆灰匠、雕塑匠、彩绘匠。蒯祥是香山帮匠人的头领。

(据《光明网》)